

对当今世界的精神病学诊断

如果当今世界去看精神科医生，填写问诊量表并参与认知功能测试，会得到怎样的诊断呢？是分离性身份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又或者，这根本就是某种尚未被医学手册记载的新型疾病？

首先，世界正罹患严重的数字妄想症，总觉得自己被监视着，而最为有趣的是，这种想法完全正确。算法确实在追踪每一步行动，分析在谷歌上的每一次搜索，预判每一个欲念。但被追踪感仅存在于患者的臆想中，这难道不正是妄想症的一个判定标准吗？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世界充满妄想，但于此有着充分的理由。这种“合理妄想”的独特状态，是一种既病态同时又是理性适应的异常表现。针对不可避免的监视，现代人正在构建一套防御机制，其与过去典型的妄想症患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与其说他害怕被追踪，不如说他在不断发明越发精巧的方式，使自己完全透明的生活变得“正常”。

与之密切相连的是快感缺失，即不能从寻常事物中获得快乐。人类正陷入对新鲜的、更强烈刺激的无尽追逐之中，简单的快乐已无法使人满足，因此，对自然的观察感悟被极限娱乐取代，传统食物让位于精致美食，真情流露为虚拟刺激所替代。矛盾的是，追逐这种强烈感官体验的同时，社会隔离现象也在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回避与人交往，畏惧他人的变幻莫测和情感需求。我

们不断加大虚拟刺激的剂量，但其效果却愈发微弱。敏感阈值在提升，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所有追寻本真的尝试，尽是徒劳。这种享乐主义升级与禁欲主义逃避之间的矛盾，与神经生物学家在实验室老鼠身上的发现类似，当这些老鼠的愉悦中枢受到电极刺激时，它们会不吃不喝，不断按压刺激杆直至精疲力竭，同时表现出应激和恐惧的症状。我们构建了全球性的多巴胺陷阱架构，却同时摧毁了自然奖励的生态系统。

信息暴食症的迹象也显而易见。世界吞食着海量的数据、新闻、观点、假说和理论，但却未能消化吸收，未能将它们整合成连贯的图景，而几乎是立刻丢弃，为新信息腾出空间。它食而不化，充而未丰。这更像强迫症的症状：无休止地攫取信息变成一种仪式化行为，以此抵御未知带来的焦虑。值得关注的是，在部分类型痴呆症病情进展过程中，神经元层面同样会出现类似的信息传导相关的病理生理异常。这是一种隐喻表达，而非指集体层面痴呆症发病的实际机制。信息噪音阻碍了理性公共叙事的形成。我们正处于一种可被称为“集体痴呆症”的现象边缘，即在知识总量名义上增长的同时，保存及传递实质性知识的能力却在不断下降。

那么，关于存在性拖延症又该如何评价呢？人类总是以数据或资源不足为借口，对根本性问题迟滞不决。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听闻人口危机迫在眉睫、关键资源即将耗竭以及养老金制度的种种弊病，但每次我们都能找到理由，把采取根本措施的决策推

迟到未来。“下一代会解决的”——这是我们集体幼稚主义的座右铭。有趣的是，这种拖延症具有其社会地理学和经济学逻辑。发达国家将生态成本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将照护劳动转嫁到移民肩上，年长一代将生态债务留给年轻一代。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金字塔型拖延结构，无法回避的矛盾被层层推诿搁置。这类似于金融金字塔骗局，上层参与者通过剥削下层，获得问题已解决的假象。唯一的区别在于，这座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尚未出生的世代，一群再理想不过的“投资者”，因为他们无法提出任何索赔。

显然，世界也饱受着注意力缺失症之苦。它无法长久集中精力来解决任何一个问题。气候危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局部战争、流行病，这一切都像投影仪中的幻灯片一样在意识中闪现，但注意力却难以驻留。然而，在这万花筒般的景象中，也存在着一些高度专注的孤岛。但难以置信的是，正是这个注意力涣散的时代，催生了对专业主题的“深度钻研”之象。各种圈群深耕狭小主题，绘制各类知识微域的超精细图谱。现代认知的分形结构由此形成：在全球性议题上浅尝辄止，同时在极专业领域中进行点状深耕。其结果是，认知地图呈现出极端的地形特征，平浅的常识平原与深邃的专业知识峡谷相邻，而这些峡谷之间往往彼此孤立。

那么自恋型人格障碍呢？

当今世界坚信自己与众不同、独一无二，认为人类从未面临过如此严峻的挑战，从未站在如此重要的十字路口，从未处于如此危急的境地。它自诩为历史的巅峰、历史意义的制高点，无法从过往中汲取教训，因为坚信，过去过于原始，毫无教益。然而，仔细审视便会发现，这种自恋正是深度自我怀疑的另一面。我们害怕自己终究不过是又一个物种，对在宇宙中特殊地位的追求终将沦为宇宙进化史中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世界还可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它在狂喜与抑郁的两极之间摇摆，时而沉醉于自身的技术成就，坚信光明的未来，说服自己只需“再发明些”什么，所有问题便能迎刃而解；时而又陷入末日般的绝望，认为世界末日就在眼前，预言文明将因某种病毒、小行星撞击或人工智能而毁灭。这些情感波动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时间范式。1950 年代，西方社会盛行的技术乐观主义与原子恐惧并存。2000 年代，硅谷的数字狂热与欧洲的生态悲观主义共存。如今，全球南方正展现出工业化阶段特有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狂喜，而后工业化的北方则陷入了反思性的忧郁之中。

不能忽视的还有习得性无助综合征。现代人坚信，面对系统性问题，个人行为毫无意义。“如果污染主要是由企业造成的，个人又何必拒用塑料制品呢？”离奇的是，世界为个人行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却也催生了普遍的个体无力感。然而，这种无力感的分布并不均衡。当某些人群陷入宿命论时，另一些人却滋生出过度膨胀的掌控感，即通过技术或者玄秘修行，营造出无

所不能的幻觉。由此，便形成了一种全能与无力的新型辩证关系：技术赋能越强大，人们对这些能力虚幻性的担忧也就越强烈。

但或许，最准确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即意识分裂，思维与现实的断裂。世界同时相信着互不相容的事物，既追求经济无限增长，又希望保护自然；既渴望个人自由，又追求绝对安全；既支持全球化，又坚持国家主权。它构建出逻辑上无懈可击却完全脱离现实的模型，创造出遵循各自因果法则的平行宇宙。由此不仅导致现实的分裂，也催生出将其粘合的绝望尝试。近几十年来，公共话语中新词汇如潮水般涌现，它们往往出现在互不兼容的语义场交界处，如“生态资本主义”“可持续增长”“全球邻里”“数字排毒”。语言中的这些混合词，正是人们竭力拼凑开裂的现实、融合无法相融之物的种种迹象。思维在试图调和矛盾的过程中，创造出逻辑上不可能但心理上所必需的新的合成结构。正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同时相信自己既活着又死了一样，现代人亦同时相信，自己既是自由的又是被决定的、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可被替代的、既是无所不能的又是无能为力的。